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比较

0410

工作和子女：中国农村女性就业和生育率

Jobs and Kids: Female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by Fang Hai et al 方海等

全球化的哪些部分对追赶型增长是重要的

Which Parts of Globalization Matter for Catch-up Growth

by Paul Romer 保罗·罗默

VOL.49

实际汇率

Real Exchange Rates

by Menzie D. Chinn 陈庚辛

2009 RIETI Survey on Currency Invoicing and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of Japanese Firms

by Ito Takatoshi et al 伊藤隆敏等

日本“失去的20年”的结构性原因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Japan's "Two Lost Decades"

by YoungGak Kim et al 金荣滋等

再分配与不平等：香港案例对大陆的启示

by Wang Shaoguang and Xia Ying 王绍光 夏瑛

政府应在一次收入分配中发挥作用

by Song Xiaowu 宋晓梧

次贷危机和董事会能力（无能）：德国的私有和公有银行

Subprime Crisis and Board (In-)Competence: Private vs. Public Banks in Germany

by Harald Hau and Marcel Thum 哈拉尔德·豪 马塞尔·图姆



[Return to top](#)

comparative studies

比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比较. 第 49 辑 / 吴敬琏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086-2432-7

I. 比… II. 吴… III. 比较经济学—丛刊 IV. F064.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588 号

比较 · 第四十九辑

主 编: 吴敬琏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6-2432-7/F · 213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849283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comparative studies

比较

卷首语

世界权威老牌杂志《经济学人》以“汇率战争”为封面，大有风暴降临之势，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有相当压力，形势空前复杂。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政策决策，除了决策者的经验、直觉和政治勇气，除了基本理论和概念的澄清之外，更需要严谨务实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它可以帮助决策层厘清问题的本质，为微观层提供可资比较借鉴的支撑。本辑《比较》正是从这一视角选取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当前的一些热点短期和长期问题——如汇率政策、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所作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文章。

方海和翁笙和等人的文章关注的是中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政策问题。他们利用2006年中国卫生和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女性就业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农就业使农村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减少0.64，实际生育一个以上子女的可能性下降54.8%。由此可以推断，未来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将通过父母的个人决策来实现，而非任何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则探讨了全球化的哪些部分对追赶型增长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回答是“创意”(idea)的全球化，这个创意通俗点说就是想法或点子，它既可能是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制度方面，罗默还对技术和制度进行了区分。对于创意的全球化来说，制度是极为重要的。而“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改变激励，而激励又会影响技术的流动和当地可获得的技术生产率”。

“汇率战争”既然已经降临，就是中国当前要应对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提供了三篇文章，分别从理论、政策和实证角度来探讨汇率。若这些认识不清楚，政策制定将只能从教条的原则出发。

威斯康星大学陈庚辛为《新帕尔格雷夫辞典》写的“实际汇率”的条目，是教科书上的内容，文章给出了实际汇率的定义、讨论了汇率随时间如何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内实际汇率的决定因素。这对国内媒体上谈汇率问题的专家厘清基本概念也许有益。

威斯康星大学查尔斯·恩格尔的文章则从汇率弹性,为什么在短期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实际有效汇率,维持实际汇率稳定的目的是要维持哪些相对价格的稳定,等等出发,分析探讨外部失衡、货币错配、汇率目标的确定、冲销干预以及货币储备五个角度对制定汇率政策的影响。他认为,在汇率政策问题上,各国政策制定者最好采取相互合作的态度,而不应把对外平衡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

伊藤隆敏等学者在对日本920家外贸制造业上市企业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从企业的微观视角如何面对汇率波动的影响。他们的调查内容包括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总体情况、针对汇率波动所做的价格调整、面向不同出口对象和经由不同出口渠道的出口贸易中各计价货币所占比重等,然后按照出口对象国、产业类别、企业规模等分门别类,分别揭示了各种情况下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殷实详尽的调查及结果,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全面地了解汇率波动对企业进而对宏观经济的真实影响,而不会陷入形形色色的货币战争论和阴谋论中,丧失应对的办法。

“比较之窗”是三位日本学者对日本“失去的20年”所做的实证分析。作者们认为,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并不是因泡沫经济崩溃及随后财政金融政策不力造成的短期问题,而是内需不足、生产率低下下的结构性长期问题,把握好这个问题是当务之急。为了求解内需不足、生产率低下这个结构性长期问题的决定因素,他们从供给、需求两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原因分析,还利用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一些表象原因背后的深层因素和一些被人所忽视的因素。这样具体而微的解剖式分析和定量分析,值得我们在探讨中国的结构性长期问题时借鉴。

第48辑《比较》从灰色收入角度讨论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从隧道效应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变化。本辑《比较》则主要讨论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王绍光的文章以香港为例,讨论政府如何在再分配的环节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以缩小收入差距,其中包括税收体制。而宋晓梧则讨论了政府如何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他认为,主要不是依靠层层落行政指令,而是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工夫,还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步伐。

在“海外特稿”栏目中,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讨论了信息时代的政府治理。他指出,信息时代的到来已经而且仍将持续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来分析和理解政府的治理,传统的分析方法依然有效。

最后是两位德国经济学家对德国银行治理的分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给德国的银行带来了巨大损失,然而有趣的是,所有陷入困境的德国银行都是国有银行。这一现象促使作者试图分析德国国有银行和私有银行的绩效差异以及导致绩效差异的原因。他们考察了德国最大的29家银行里一共593位监事会成员的资料,发现私有和国有银行的监事会成员在金融和管理经验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监事会成员在金融方面能力的强弱与银行在金融危机中的损失程度相关。由此,他们认为,改进银行治理水平是降低银行脆弱性的一项合适的措施。

1 工作和子女

中国农村女性就业和生育率

Jobs and Kids: Female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by Hai Fang, Karen Eggleston, John Rizzo and Richard Zeckhaue

方海 翁笙和 约翰·里佐 理查德·泽克豪泽

前沿 **Guide**

8 全球化的哪些部分对追赶型增长是重要的

Which Parts of Globalization Matter for Catch-up Growth

by Paul Romer 保罗·罗默

汇率理论和政策 **Exchange Rate Theory and Policy**

14 实际汇率

Real Exchange Rates

by JMenzie D. Chinn 陈庚辛

18 汇率政策

Exchange Rate Policies

by Charles Engel 查尔斯·恩格尔

38 日本企业的计价货币选择和汇率风险管理

**2009 RIETI Survey on Currency Invoicing and
Exchange Rate Risk Management of Japanese Firms**

by Ito Takatoshi, Koibuchi Satoshi, Sato Kiyotaka, and Shimizu Junko

伊藤 隆敏 鲤渊 贤 佐藤 清隆 清水 顺子

04 10

Vol.49

《比较》
2010年第4期 总第49辑



主编 吴敬琏
编委名单 崔之元
(按拼音排序) 高世楫
郭树清
焦津洪
李剑阁
林毅夫
楼继伟
卢 迈
钱颖一
荣敬本
王则柯
吴敬琏
吴晓灵
谢 平
许成钢
张春霖
赵人伟
周小川

责任编辑 肖 梦
吴素萍

比较之窗 **Comparative Studies**

- 83 日本“失去的20年”的结构性原因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Japan's "Two Lost Decades"
by YoungGak KIM, Fukao Kiyoji and Makino Tatsuji
金 荣慈 深尾 京司 牧野 达治

改革论坛 **Reform Forum**

- 118 再分配与不平等
香港案例对中国大陆的启示
**Re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
Implications of Hongkong Case for the Mainland**
by Wang Shaoguang 王绍光 夏瑛

- 128 政府应在调节一次分配中发挥作用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in Income Distribution
by Song Xiaowu 宋晓梧

海外特稿 **Special Feature**

- 131 信息时代的政府工具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y Christopher C. Hood 克里斯托弗·胡德

法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 141 次贷危机和监事会能力(无能)
德国私有银行和国有银行的比较
**Subprime Crisis and Board (In-)Competence:
Private vs. Public Banks in Germany**
by Harald Hau and Marcel Thum 哈拉尔德·豪 马赛尔·图姆

工作和子女

中国农村女性就业和生育率

Jobs and Kids:

Female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方海 翁笙和 约翰·里佐 理查德·泽克豪泽

理解女性就业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效率的人口政策至关重要。本文的论述基于对中国 2 000 多名 20~52 岁妇女的新研究,该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可使女性的平均生育个数下降 0.64,使生育多于 1 个子女的可能性降低 54.8%。

随着日益临近的人口老龄化,政策制定者对生育率越来越重视。虽然欧洲的低生育率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灾难 (Doepke et al, 2008),但一些高收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更低,例如日本和韩国。在一些高速发展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包括中国 (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表 1),生育率也已显著下降。在中国,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个人因素,进一步强化了现行政策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

与此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普遍提高了 (图 2)。学者们 (Soares 和 Falcao, 2008, 第 1060 页)提供的令人注目的证据表明,在过去 100 年里,美国、英国和巴西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最近几十年,在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例如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女性的非农业就业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图 3)。这些实证证据以及经济理论表明,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有显著的联系,而且其因果关系是双向的 (Killingsworth 和 Heckman, 1987; Kalwij, 2000)。

确定因果效应

利用美国收入动态版面研究数据,克

* Hai Fang,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卫生体制、管理和政策系助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组织及公共卫生。Karen Eggleston, 获哈佛大学博士,现为斯坦福大学 Shorenstein 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及“亚洲卫生政策项目”负责人、斯坦福大学 Health Policy / Primary Care and Outcomes Research 中心的研究员,同时还担任东亚研究方面的教学工作。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卫生保健体制、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卫生改革、政府和市场在卫生部门中的作用、支付激励、卫生保健和医疗制度的生产效率,以及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学。John Rizzo, 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学和公共卫生,曾在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以及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等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Richard Zeckhause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Frank Plumpton Ramsey 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 (AAS) 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 (NAS) 医学研究院当选成员 (elected member)。他著述甚丰,已发表 250 多篇学术论文 (包括与人合著),还有若干已出版和待出版的专著 (包括与人合著)。——编者注

表 1 中国农村生育率：非农就业妇女和无就业妇女（中国卫生和营养研究 2006 年样本）

实际的子女数量	无非农就业		有非农就业	
	频率	%	频率	%
0	67	4.618	52	6.213
1	583	40.179	597	71.326
2	639	44.039	160	19.116
3	137	9.442	22	2.628
4	16	1.103	5	0.597
5	9	0.620	0	0.000
6	0	0.000	1	0.119
总计	1 451	100.000	837	100.000

愿意要的子女数量	无非农就业		有非农就业	
	频率	%	频率	%
0	52	3.584	29	3.465
1	481	33.150	527	62.963
2	721	49.690	226	27.001
3	165	11.371	48	5.735
4	19	1.309	6	0.717
5	11	0.758	0	0.000
6	2	0.138	1	0.119
总计	1 451	100.000	837	1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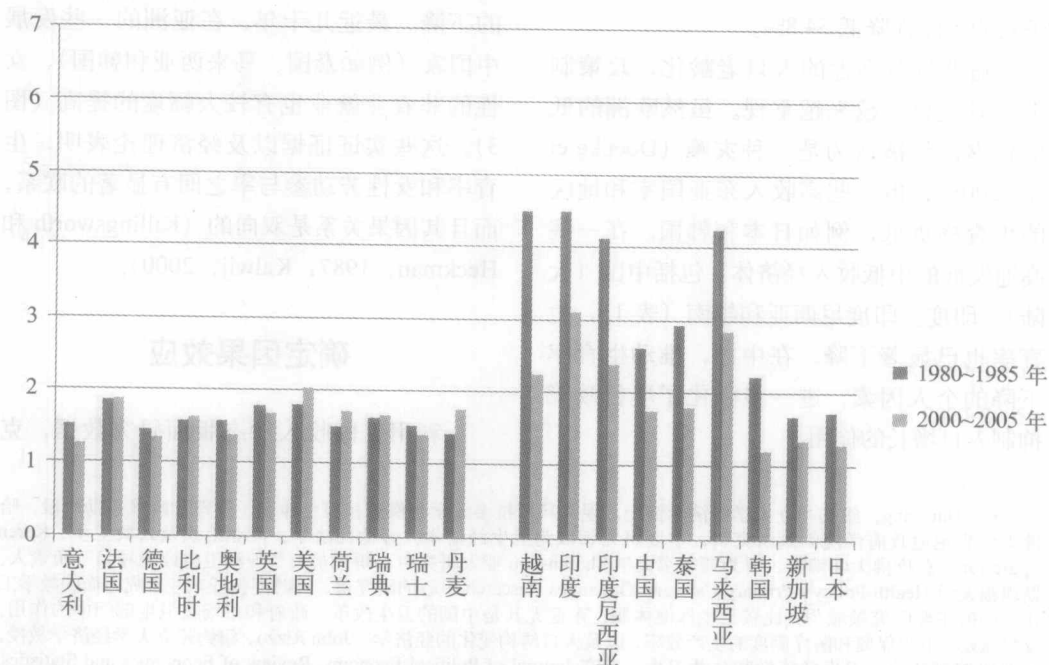


图 1 1980~2005 年，部分西方和亚洲国家的总生育率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给联合国的数据（最后与 2008 年 5 月 22 日更新）。总生育率是国家劳工组织 5 年间隔数据的平均估算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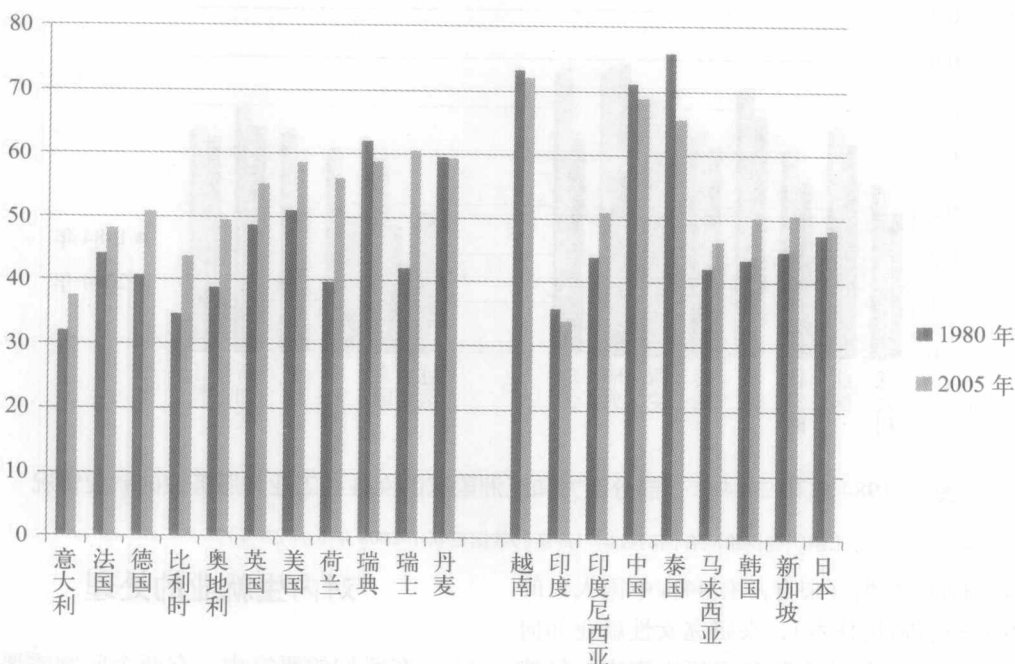


图2 1980年和2005年，部分西方和亚洲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给联合国的数据（最新的数据更新于2008年5月22日）。

雷默（Cramer, 1980, 第167页）指出：“从短期来看，生育率对就业起支配效应，从长期来看，则是就业影响生育率。”

女性就业导致低生育率，因为工作减少了女性的可支配时间。养育子女耗费时间，所以就业女性选择较少的孩子。一些城市，如香港和上海，确实呈现出相对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极低的生育率。香港年近40岁的妇女，就业率高达75%，但生育率属于全世界最低之一。

但是女性就业也可能会提高家庭收入，使家庭更有能力承担养育子女的花费，从而导致高生育率。尤其在中国农村，生儿育女（特别是儿子）仍然受到重视，子女既可以帮着干农活，还能为父母提供老年保障（Hussain, 1994），因为农村养老系统最近才推行并且范围有限。确实，即便

是意大利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也有证据显示，当老年保障减少时，生育率有所提高（Billari 和 Galasso, 2008）。

中国的生育挑战

中国的决策者应当特别重视就业与生育率的关系。中国有13.4亿的庞大人口和推行了将近30年的有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几乎所有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生育率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就已经开始大幅下降，但独生子女政策似乎仍然大幅降低了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

我们最近的研究（方海等人，2010）表明，决策者应该考虑女性非农就业会降低生育率。我们运用2006年中国卫生和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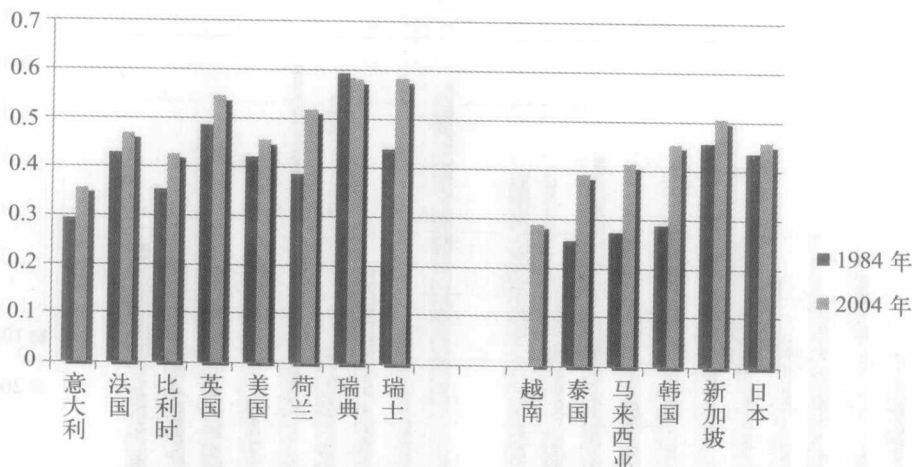


图3 1984年和2004年，部分西方和亚洲国家的女性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情况

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给联合国的数据（最新的数据更新于2008年5月22日）。

养调查的数据（来自占有44%中国人口的9省分层随机样本），来研究女性就业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实际和意愿生育率。虽然这一数据并不能严格地代表全中国，但仍然反映了反映中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方面广泛的多样化。

我们的研究使用了两个生育率变量：实际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实际生育率记录了已婚妇女的健在子女数量。意愿生育率是实际生育率和对如下问题回答的总和：如果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子女数量，你还会多要几个子女。考虑到子女有益的经济作用（尤其是男孩的经济作用，不过女孩的经济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还有各省对生育的限制，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意愿生育率至少和实际生育率一致。

我们的样本包括2000多名20~52岁的已婚妇女，超过1/3的妇女有正式或临时的非农就业。我们发现平均每个无非农就业妇女有1.641个子女，其中大约有55%的妇女有一个以上子女。相反，有非农就业妇女的平均子女数为1.205，其中仅22.5%的妇女有一个以上子女。

对内生就业的处理

在我们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处理：非农业就业如何影响生育，以及非农就业是不是内生的。其实，妇女的子女数量一直被认为会影响其劳动供给（Killingsworth和Heckman，1987）。

我们使用两个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就业的问题。

第一，妇女居住的村庄是否有公交车站；

第二，村庄中劳动力被雇员达20人以上的企业雇用的比例。

当地是否有大企业，反映了妇女可在当地被雇用的机会，而公交车站可以使妇女到其他村庄和城市工作更容易，这样就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超过3/4的有非农就业的妇女，她们的村庄有公交车站。对于没有非农就业的妇女，这一比例低于2/3。因此，妇女所在村庄是否有公交车站对妇女的非农业就业有显著影响。同样的，村庄中劳动力被雇员达20人以上的企业雇用的高比例也是影响妇女非农业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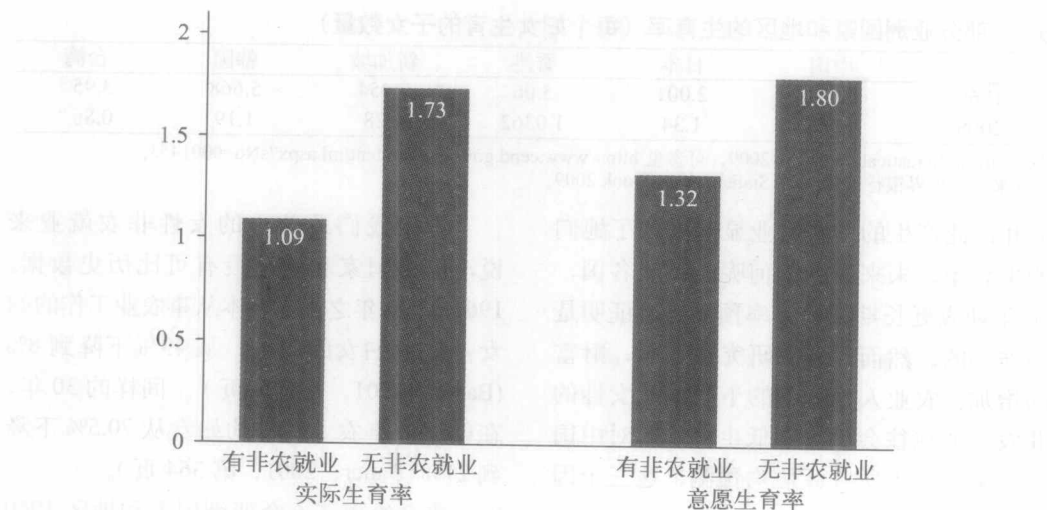


图4 非农就业对中国农村已婚妇女生育率的影响

数据来源：作者使用2006年中国卫生和营养调查数据纠正内生性后的估计。

就业影响生育率的新见解

我们发现妇女非农就业降低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生育率和意愿生育率。根据我们首选的模型估计，同时将其他因素保持在其样本均值水平上，图4显示，非农业就业使妇女的平均实际生育子女个数减少0.64，使意愿生育子女个数减少0.48。非农就业使妇女实际生育一个以上子女的可能性下降54.8%，使妇女愿意生育一个以上子女的可能性下降49.6%。

政策含义

2010年3月，中国宣布将投资相当于60多亿美元的资金以促进就业，尤其是农村流动人口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中国日报》，2010）。女性在这些促进就业的努力中是否有同等的机会？

有关欧洲的研究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是二战后生育高峰的催化剂（Doepke et al., 2008）。在中国，这种情况

也有可能存在。尽管有毛泽东主席的著名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自1979年以来，在经济衰退时期，中国农村女性所受的影响尤其大，即使考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女性非农就业所受的影响也相当显著（Zhang et al., 2002）。同时，董晓园等人（2004）指出，在过去30年的改革中，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其工作的支配权更小，工资收入更低，且成为农村新私营企业股东的可能性也要低得多。

中国面临着人口规模和就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鼓励更多的女性参与非农就业可以显著降低生育率，因而无需对超生施以惩罚或罚款，这种政策使中国备受批评。投入更多的资金提高女孩和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就业促进政策的补充，因为教育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生育率（Becker, 1991），同时提高了女性和整个经济的生产率。中国农村女性就业与生育的相关关系指出了通向双赢政策的道路。

我们的分析简要评估了中国的生育状况。通过研究农村女性，我们发现就业机

表 2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 (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中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韩国	台湾
1960	5.469	2.001	5.06	5.454	5.668	3.95 ^a
2008	1.765	1.34	1.0362	1.28	1.19	0.86 ^a

注: Taiw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可参见 <http://www.cepd.gov.tw/encontent/ml.aspx?sNo=0001453>。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和 Taiw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会和由此产生的非农就业显著降低了她们的生育率。未来又会如何呢? 纵观各国, 10 年期或更长期的生育率预测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然而, 无数研究也显示, 财富的增加、农业人口比率的下降以及女性的非农就业往往会显著降低生育率。对中国的未来, 几乎所有评估均预测, 这三个因素都会出现。

与中国有着相同民族及文化特征的东亚国家和地区, 它们的经历或许可以使我们洞悉中国的未来。如今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都已大幅提高, 农业部门显著缩小。2008 年, 中国的人均收入是 2 940 美元¹, 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收入是 15 276²美元; 韩国是 21 530 美元;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31 420 美元; 新加坡是 3 4760 美元; 日本是 38 130 美元。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没有大量的人口从事农业。农业人口最多的是韩国 (7.4%³) 和中国台湾地区 (5.1%⁴)。然而 50 年以前, 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定比例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从事农业生产。1980 年, 农村人口的百分比在韩国是 34%,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是 14%, 在中国台湾地区是 13%, 在新加坡是 13%, 在日本是 10.4%。2002 年, 44% 的中国人口的主要家庭收入来源是农业; 这一数字在 1987 年是 60%。

1 除非特别说明, 所有数据都来自 World Bank Data Bank。

2 Taiw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可参见 <http://www.cepd.gov.tw/encontent/ml.aspx?sNo=0001453>。

3 2007 年数据。

4 2008 年数据。

对于我们最关心的女性非农就业来说, 很多国家和地区没有可比历史数据。1960~1990 年之间, 日本从事农业工作的妇女占就业妇女的比例, 从 43% 下降到 8% (Bauer, 2001, 第 364 页)。同样的 30 年, 在韩国从事农业工作的妇女从 70.5% 下降到 27% (Bauer, 2001, 第 364 页)。

表 2 给出了 6 个亚洲国家和地区 1960 年和 2008 年的生育率。纵观这些国家和地区, 生育率都有显著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当今的生育率仍然在其他 5 个国家和地区之上。此外, 中国还有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 而其他 5 个国家和地区并没有类似的人口控制政策, 相反, 个别国家和地区还有促进生育的政策。

所有这些都显示, 如果中国的未来会像多数学者预测的那样, 在收入、农业人口和非农就业等方面, 越来越接近这些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生育率也会显著下降。而且, 生育率的下降是通过父母的个人决策来实现的, 而非任何严厉的计划生育措施。

参考文献:

Bauer, John (2001), "Demographic change, development, and the economic status of women in East Asia." In *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Challenges Met, Opportunities Seized*, Andrew Mason, edito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59-384.

Becker, Gary S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illari, Francesco C, and Vincenzo Galasso

- (2008), "Why Do We Really Have Children?" VoxEU.org, 22 October.
- China Daily (2010), "China to invest \$6.34b to boost employment", 5 March.
- Cramer, James C (1980), "Fertility and Femal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Causal Dire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2):167-190.
- Doepke, Matthias, Moshe Hazan, and Yishay Maoz (2008), "More Babies for Europe: Lessons from the Post-war Baby Boom", VoxEU.org, 8 September.
- Dong, Xiaoyuan, F MacPhail, P Bowles, and SPS Ho (2004), "Gender Segmentation at Work in China's Privatized Rural Industry: Some Evidence from Shandong and Jiangsu", *World Development*, 32(6):979-998.
- Fang, Hai, Karen N Eggleston, John A Rizzo, and Richard J Zeckhauser (2010), "Female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Rural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15886, April.
- Hussain, Athar (1994), "Social Security in Present-Day China and its Refor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2):276-80.
- Kalwij, Adriaan S (2000), "The Effects of Female Employment Status on the Presence and Number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3(2):221-239.
- Killingsworth, Mark R, and James J Heckman (1987), "Female Labor Supply: A Survey," in , Orley C Ashenfelter and Richard Layard (eds.), *The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 Soares, Rodrigo R, and Bruno LS Falcao (2008),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2):1058-1104.
- Taiw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cepd.gov.tw/encontent/m1.aspx?sNo=0001453>.
- Zhang, Linxiu, Jikun Huang, and Scott Rozelle (2002), "Employment, Emerging Labor Markets,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3): 313-328.

全球化的哪些部分 对追赶型增长是重要的

Which Parts of Globalization Matter for Catch-up Growth

保罗·罗默

斯坦利·费希尔 (Stanley Fisher) 在他的埃利演讲 (Richard T. Ely Lecture)¹ 中, 将全球化分为跨国界的经济和非经济交往。他说: “经济全球化是各国之间持续的更高层次的经济独立过程, 表现为跨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量的增加、资金流动量的增加和劳务流动的增加。”我和琼斯最近提出, 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全球化² (Johes 和 Romer, 2010)。全球化是由创意再利用所带来的收益驱动的。创意流动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对消除贫困和追赶型经济增长尤为重要, 但多数经济学家却因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羞于谈起。

1. 健康和全球化的证据

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可没这个顾虑。“大多数人, 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的居民, 他们的平均寿命取决于在别的地方产生的创意、技术或医疗手段” (Deaton,

2004)。而且根据他和其他人的观察, 再利用这些思想得到的收益是不可忽略的。

在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中, 莫里森等人 (Francois Bourguignon 和 Christan Morisson, 2002) 显示,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虽然穷国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越差越远, 但人均寿命正在逐步追赶。他们用很简单的办法来衡量人均寿命的提高, 然后把这个值加到传统的人均收入中。用传统方法衡量的全球收入不平等在 20 世纪愈演愈烈, 但是算入了人均寿命的收入不平等在“二战”后很快就到达了顶峰。

加里·贝克尔等人 (Gary S. Becker, Tomas J. Philipson 和 Rodrigo R. Soares, 2005) 对死亡率下降值提供了更仔细且更保守的预测, 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从 1960 年到 2000 年, 全球半数贫困人口所在国的人均收入约为 900 美元 (以 2000 年国际美元等值衡量)。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 人均收入增长了 2 200 美元。人均寿命从 41 岁

* Paul M. Romer 为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比较》第 45 辑曾刊发了他和同事合著的《新卡尔多事实: 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一文。原文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0, 10 卷第 2 期, 第 1~7 页。——编者注

¹ 埃利演讲 (Richard T. Ely Lecture) 是美国经济学会在 20 世纪 60 年代年设立的以其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埃利——命名的演讲, 演讲者都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² 本文的中文版《新卡尔多事实: 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 请参见《比较》第 48 辑。——编者注

增加到 64 岁，相当于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的收入增加了 1 500 美元，他们最终得出的收入估计值是 4 600 美元而不是 3 100 美元，几乎多了一半。这么大的变化就其本身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绝不亚于我们所估算的货物及服务的贸易所得。它们还为我们理解政策在限制和促进贸易所得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阅读这些论文之前，我的发展隐模型（implicit model）考虑了世界技术库 T^* 和贫困国家技术库 T 之间的常见差距。一国特有的要素 R （表示制度 rules）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入该国的速率。如果有良好的制度， T 会很快追赶上 T^* 。如果有糟糕的制度， T 可能根本就不会有增长。结果就是 R 的改变可以解释我们在不同贫困国家看到的差距极大的增长速度。这种模型对数据作出了合理的初步解释。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制度及其创造的动力可以影响 T^* 和 T 的增长，其中 T^* 是科技前沿，而 T 是 T^* 的追赶者。但是健康领域的数据显示，这种一维模型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相互作用。不同类型的技术 T 会和制度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制度可能会使减少死亡率的技术进入贫困国家，同时又将提升人均收入的技术拒之门外。

要想获得全球化的潜在收益，我们就需要更好地了解这些创意类型的不同之处，了解它们和各地种本地制度体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我们用来论证更多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模型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来说，有害无益。

2. 教科书上的贸易理论

标准教科书对比较优势和贸易收益的处理方法完全依赖单一要素：劳动力，然后就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比如牛肉

和土豆。现在，我们假设这两种产品是降血压片和降胆固醇片。在富裕国家，1 个工人可以生产 10 单位的其中任何一种药品。而在贫困国家，工人生产疗效不那么好的老一代药品，其中 1 个工人可以生产 5 单位的降血压片或者 3 单位的降胆固醇片。

像以往一样，我们也可以使用单一要素、两种产品为背景，来演示药品贸易相比于自给自足会怎样提升全球的健康水平，但要是真的这样做，这出“戏”可就演砸了。药品贸易本身就是缺乏效率的标志。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是让贫困国家的工人用富裕国家工人使用的同一配方来制造药品。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制度允许贫困国家的工人免费得到这个配方，那我们就能从全球化中得到巨大收益，而不必进行传统的货物或服务贸易。

为了不让某些人抓住把柄，我得声明一下这并不是说限制贸易就是好事；也不是说知识产权就是不好的（或者是好的）。这其中的真正含义是我们需要更丰富的“语言”来进行理论分析，让药品配方这样的创意可以穿越国界。如果我们看到和描述的只是货物和服务流通，我们就有可能忽略更深层次的力量，从而时不时地得到错误的信号。更多的传统贸易可能预示着创意的跨国流动不足且缺乏效率。

3. 案例和常用语

在讨论创意和阻碍创意流动的壁垒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创意的再利用之所以效率低，是因为成本太高，或者说，创意的再利用其实是有效率的，但糟糕的制度阻碍了这种利用。这是典型的观点交锋：一方说“贫困国家应该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现有的技术”；另一方却说“知识随时可得，但

是它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要澄清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明确的语言和基于特定案例的微观基础研究。

降低胆固醇或血压的药物的化学配方就可以作为特定创意的真实例子。口服补液疗法（ORT）在增加贫困国家人均寿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估算，口服补液疗法每年可以拯救 300 万~500 万人的生命。这也有力地驳斥了我们无法追踪创意流动的论调。你可以到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数据库去查询这种疗法治愈了多少腹泻的孩子。数据的覆盖面相当零散，但以后肯定会改善。

在接下来的讨论里，一些相互对比的创意类型对我们的分析相当有用。第一对创意来自公用事业。建设移动电话网的创意和建立市立自来水系统的创意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另一对创意来自交通系统。第一个创意是收取道路拥堵费。另一个创意是让飞行员和空管人员用一些特定的英文词汇来交流沟通。

最后一条制度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飞行员和空管用事前约定的词汇来通信可以消除普通语句中的模棱两可。当一个飞行员精确地用约定的那些词汇向空管人员“宣布紧急状态”时，通话两方和通话频道中的所有其他飞行员都确切地知道这其中的法律和程序含义。

经济学家们在交流思想时，也可以从类似的语言结构中受益。像公共品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让经济学家们用这种模糊的定义来交流，是对脑力的一种低效率利用。既然我们有简单明确的词汇来组织思想交流，那么就该坚持使用这些词汇。

研究公共财政的人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对竞争性物品和非竞争性物品的

二分法。现在，每个经济学家肯定都能复述这两种物品的定义。但是，别忘了，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测试验证这两种重要的情形。你电话说的东西，在课堂上讲的东西，写在纸上的东西或者在互联网上传送的东西，肯定是非竞争性的。口服补液疗法的配方就是一种非竞争性物品。

第二个逻辑上独立的概念就是排他性概念。富裕国家的法律允许制造新药的配方专利有部分排他性。在一定时期内，如果得不到专利持有人的许可，就不得使用这个配方。有些工人制造过时的药品，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新药，而是相关的制度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口服补液疗法的配方既不是竞争性的也不是排他性的。谁都没有法律权利阻止其他人照方应用。

竞争性和排他性（以及他们的反义词）就是我们用来描述思想的全部概念。溢出、外部性甚至公共品这些对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含义的相关名词，最好避而不用。

人力资本是个非常有弹性的词，但是放弃这个词有点得不偿失。人力资本的微观基础研究可以消除对这个词的含糊使用。人力资本都是肉长的。肉是排他性的。肉也是竞争性的。但是，就像有人提出的，问题在于肉怎么能产生出思想，并写在书上、在课堂上讲、在互联网上发送，不过这并非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非竞争性物品在现实中到底有多重要，理性的人对此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既不是语义学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些证据，比如因推广新疗方法而避免的腹泻致死人数，来解决这种意见分歧（或者我们可以干脆让安格斯·迪顿替我们做这些）。如果存在非竞争性物品，在全球范围内分享这些物品就会带来收益。

对于非竞争性物品最佳的排他性程度，